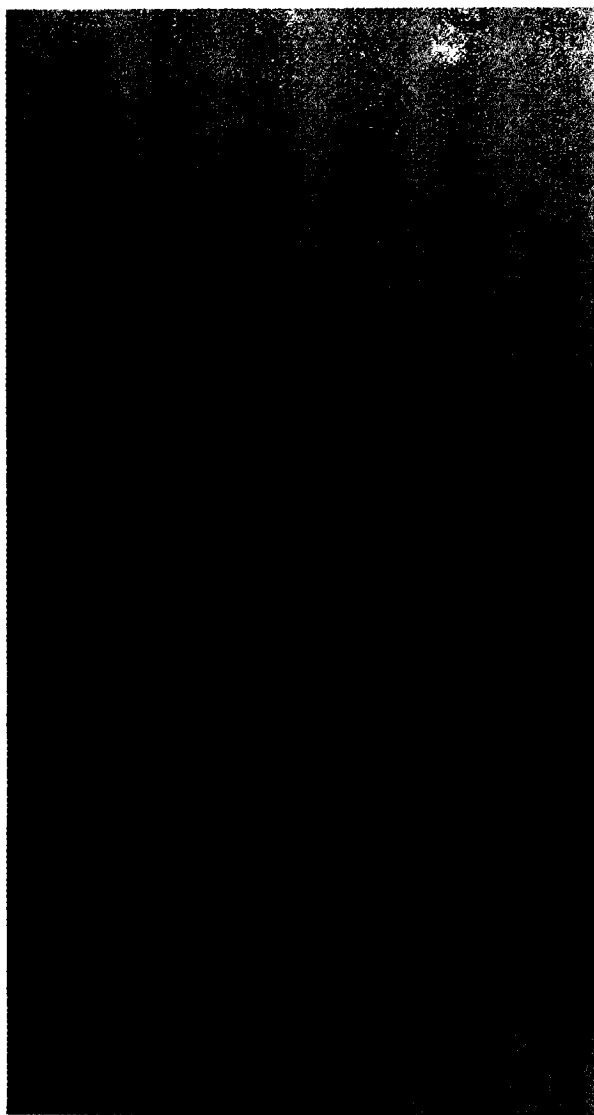


上 编

明 本 春 秋

“明本”一词，具有很宽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明代雕版印刷、套版印刷的书籍，也涵盖了用活字摆印的书籍以及抄写、彩绘的书籍。明代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辉煌时期，刻书的数量之多、地域之广、技术之高、影响之大，是以往各代无法相比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明代刻书数量多达 35 000 种；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书坊几乎都在刻书，刻

书地域遍布全国，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刻书尤多。这个时期，活字印刷、套版印刷日渐风行；“短版”“拱花”的发明和应用把雕版印刷的技术水平推向巅峰。文学、艺术、医学、科技诸方面的名篇巨著，不仅影响着当时也影响着未来，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明代不仅刻书风靡全国，文人抄书也盛行于世。本书仅对明本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明本发展的社会背景及主要原因

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使经济迅速发展

1368年,朱元璋经过多年的征战,终于力挫群雄,登上了皇帝宝座,定都金陵(今南京),建立大明帝国,是年改为洪武元年,朱元璋为明太祖。由于元朝统治者和蒙古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摧残,元末农民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元末各地的连年战乱,更使得社会秩序极混乱;而沉重的租税与徭役,又造成农民大量逃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面临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对新兴的明王朝执政者是严峻的考验。朱元璋首先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办法。他认为: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洪武实录》)根据朱元璋的这个指导思想,明王朝先后采取了蠲免税粮、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等一系列措施。到洪武末年,整个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改观。另外,朱元璋还加强了民政、地政的整顿和管理。民政方面,先后推行户帖制度、黄册制度;地政方面,派人到各地主持监督丈量土地,实行鱼鳞图册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打击了豪强地主,而且对平均赋税徭役,减轻农民负担,安定社会秩序,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朝政府对手工业者也实行了新的政策,下令改变工匠的服役制度。规定不为官府服役的工匠,缴纳顶工银即可。工匠在服役以外

的时间，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这些政策，激发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不但构成了明朝政权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其他一切事业，如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刻书出版等事业发展的前提。其中特别是工匠政策的调整，则直接关系到包括刻书工匠在内的切身利益。

二、重教兴学，培养选拔人才；举贤招隐，重用贤能之士

朱元璋虽然家境贫寒，又出身行伍，仅粗通文墨，但他对文化却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因此，还在他争打天下的时候，“即开学校，延师儒，俾勋贤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黄佐《南雍志》卷二三）。待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更加重视文治的作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尝谕国子生，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将入相，安定社稷”（黄佐《南雍志》卷一），透露出他的教育方针是要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同年，朱元璋还诏谕中书省，称“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

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黄佐《南雍志》卷一）。自此，全国各府州县皆先后设立儒学。朱元璋还特别关心北方的教育，称“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之务学，贤才可兴”（黄佐《南雍志》卷一）。洪武八年（1375），又“命丞相往国子学，考校老成端正、学博经通者，分校天下。令郡县广其生徒而立学焉”（黄佐《南雍志》卷一）。朱元璋这样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皇帝，使明代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永乐十八年（1420），南京的国子监有学生9000余人，这在以前历代是少有的（柳诒徵《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太学》）。各地的郡学、县学也普遍建立，“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史》卷六九）。明朝沿袭了唐宋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读书风气。朱元璋还特别重视举贤招隐，称“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犖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余继登：

《典故纪闻》卷一)。同时还营造礼贤馆于应天,给招聘来的贤能之士以优厚的待遇。一时“陶安、夏翊、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鄂尔泰、张廷玉《明纲目前纪》卷上)。朱元璋这一系列重教育、拔人才、聘贤士的政策,对于促进明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也为刻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三、注意采集图书,重视教化作用;诏除书籍税收,刺激刻书事业

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是明太祖一贯的思想,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发兵攻灭陈友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明朝初立,又“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六)。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图书典籍很重视。这无疑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明代刻书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是与朱元璋对刻书实行了特殊政策分不开的。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

展的举措。据《明史·本纪第二·太祖二》载:“洪武元年八月,除书籍、田器税。”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的。明代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刻书事业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和解放。这与元朝统治时期有天壤之别。蒙古统治者在未过江之前,施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出售三十册书籍,其中一册书籍的书款,作为税收上缴。渡江以后,税收变本加厉,由原有的“三十税一”改成“二十税一”,不仅使出版者怨声载道,也影响了书籍的印刷与传播。明代上自朝廷内府、诸王藩府、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府、州、县及其儒学,都以刻书为风尚,下至南北两京、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则书铺如林,书溢市肆。明代刻书事业能够出现如此局面,可见政策的重要性。如今大量流传于世的明代官刻私雕书籍,是其有力见证。

四、宽松的出版政策,为书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众所周知,元朝对著述和刻书的管理非常严格。关于著述,元代刑法中明文规定“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

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元史·刑法志》);而刻书要由本路进呈著作,经过逐级批准,才能出版。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云:“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清代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这种管理方式主要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防范之心。结果使得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书,因为不符合政府的口味,失去了出版的机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流传下去的机会。元代人的著作本来就不多,加上这种限制,印本就更少了。明代政府虽然也有书禁,但是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与元代相比还是相当宽松的。明政府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干涉也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 15 725 种,其原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有直接的关系。在明代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于“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歿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

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 35 000 种,其中明人著述超过半数。

五、发达的经济,刺激图书的消费

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相对稳定,至洪武十八年(1385),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卷七十八)。尤其是江浙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繁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曾有这样的描述:“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奢侈者,争趋效之。……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膏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苳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

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都对刻书出版业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城镇居民迅速增加，他们生活相对稳定。当他们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立即对文化精神生活提出相应的或更高的要求，于是戏曲、小说等平民文化作品便大量产生并版行于世了。“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著。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则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忍为披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騞》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此段描述，正是明代社会戏曲、小说普遍流行的真实写照。这也说明，明代的小说、戏曲在宋元两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因为它们通俗易懂，写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又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深受人民大众尤其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喜爱。一些封建文人不仅不以为非，而且还参与创作。因此，明代的戏曲、小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印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明代的官府藏书、私人藏

书规模大大超过前代，有力地刺激刻书业的发展。明代中央政府藏书十分丰富，杨士奇编的《文渊阁书目》著录的 7 294 种；编纂《永乐大典》时所抄录的图书，估计有 8 000 种之多。据范凤书先生著《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明代有 897 位藏书家，其中藏书数量在 10 000 卷以上的有 200 多人，如范钦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 70 000 多卷；又如祁承燾澹生堂，藏书达 9 000 多种；还有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藏书达 80 000 余卷；最多的是宜春的张自烈，藏书达 300 000 卷。而且很多是明代人著述。不少明代的私人藏书家致力于刻书事业，如毛晋就不是为藏书而收书，而是获得善本便刊刻，以广流传。毛晋所刻之书，底本好，校讎精，具有较高的质量。当时有“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朝鲜古国名）巨贾争摹印”（吴伟业《汲古阁歌》）之说。清代学者朱彝尊也说，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严孺人墓志铭》）。此外，范钦、袁褰、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等藏书家同样有刻书的善举。

六、制书材料的进步， 为刻书业提供了良好 的物质基础

纸、墨、笔、砚等是刻书业的基

础，与刻书业的发展兴衰有直接的关系。纸、墨、笔、砚等行业的发展，可以满足刻书、抄书的需要，书业的兴盛又带动各行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相互促进与发展。明代笔、墨、纸、砚的制作，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超迈前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

以笔而言，生产规模之大、分布地域之广、新品名笔之多，是明代笔业的特点。湖笔、湘笔、京笔是主要的支柱产品，时人有“南有湖笔，北有京笔”之誉。品种的增多，为书家誊稿、学子习字，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为明代精美的写刻本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墨是印刷的主要材料之一。在明代，制墨业有大规模的发展。徽州是明代最著名的产墨地，墨不但产量大，而且质量好。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里的制墨作坊有近百家，所产的墨销行全国，甚至出口到国外。制墨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徽州制墨最有名的是程君房（大约，字幼博）与方于鲁（瑞生）。他们所制的墨有几百种不同的规格和形制。他们还撰写并刻印了制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氏刻印有《墨苑》，方氏刻印有《墨谱》。徽州制墨多以黄山松为主要原料，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介绍了松烟制墨的方法。松烟制墨有不同的等

级，书坊印刷，考虑到成本，往往选用价廉的下等墨。私刻本或官刻本，为保证印刷质量，往往选用上等墨。因此不少传世之本，虽然经历数百年，墨色依然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除徽州的制墨业外，在其他印刷业较集中的地区，也都有一定数量的制墨作坊。明代还出现用蓝靛印刷书籍的现象，这是一种印刷的新材料。成化年间起，在建阳的坊刻本中出现了这种印本。

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间接地为明代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纸是书籍的载体，明代造纸业又有新的发展，纸张的产量和质量都超过宋、元时期。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是明代纸张的四大产地。江西广信府的永丰、铅山等地，是产纸的集中地，其原料有构皮、竹丝、百结皮等，这里造的纸漂工精细，纸质洁白，工艺精良，是印刷的上等纸张。福建盛产竹子，生产的纸张多以竹子为原料。浙江造纸以瞿溪为中心，多以桑皮为原料生产纸张。安徽的兴国、泾县、徽州以产棉纸而闻名。明代纸张的品种有

一百多种，用于印刷者只有一部分。其中衢州各县的书籍纸，建阳的书籍纸，永丰的棉纸，常山的束纸、宝钞纸等都是印书的上等纸。胡应麟说：“凡印书，永丰棉纸为上，常山束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谢肇淛说：“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版书，须用棉料白纸无灰者，福建、浙江都有。楚、蜀、滇中棉纸莹薄，尤宜于收藏。”（《五杂俎》卷一二）总之，明代造纸业的发达，为印刷业提供了足够的原材料。使明代产生的一些鸿篇巨制，得以广泛流传。

另外，纸、墨、笔、砚等行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刻书业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尤其满足了文人读书、藏书的需要。明代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都非常重视抄书，这是因为当时的许多善本、秘本不易得到，只能抄录副本收藏；其次，一些藏书家经济条件有限，不得不通过抄书来节约开支，增加藏书。总而言之，明人藏书、抄书的习惯，也有利于纸、墨、笔、砚业的发展。

七、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刻书成本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亡城镇，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城镇和城镇居民迅速发展。这给手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刻书业也是如此。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称：“……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两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貳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貳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低廉的刻书工价，不仅降低了刻书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刻书业内部的竞争力，从而有力地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

上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正是明本发展的主要原因。

明朝政府的刻书机构及其刻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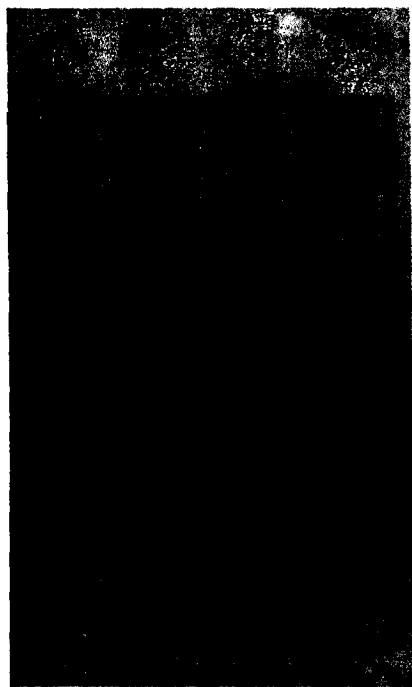
一、内府刻书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后，非常注意文化教育事业，洪武元年（1368），首先在南京宫中建起“大本堂”，将其子孙送入学习，他渴望自己的子孙成为文武全才，国家栋梁。洪武二年（1369），又下令在全国府、州、县建立儒学，培养人才。此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书籍的收集，诏求四方遗书。朱元璋一系列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举措，以及洪武元年（1368）书籍田器不得征税等相关诏令的实施，使明代的刻书事业得到长足地发展。内府刻书起到了表率作用。其实，明太祖朱元璋未取得天下之前，便开始令其属下编纂刻印书籍。《明实录》记载了己亥正月庚申（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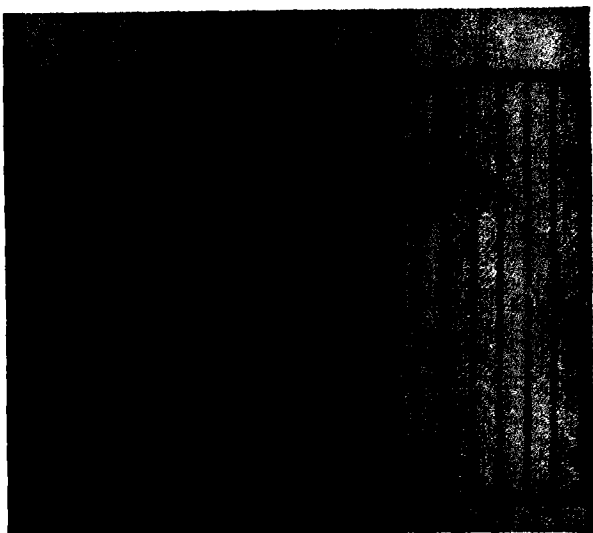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让儒士许瑗、王冕尝仿《周礼》著书一编”又如“丙午十一月壬辰（即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修《公子书》及《务农技艺商家书》成”明朝建立后，内府早期的刻书，是皇宫内的一些机构负责。司礼监成立后，内府的刻书，逐渐由司礼监所管辖的经厂接替完成。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制，为内廷十二监之首，二十四衙门之一。经厂的刻书规模随着司礼监权力的不断扩大而发展，监中专司镌刻刷印的工匠数目也随之变化。洪武时有500多名，其中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时，司礼监内工匠达1583名，其中专事刻书者近1300名，纸匠62名，裁历匠80名，刊字匠315名，刷印匠134名，折配

匠 189 名，装裱匠（装订匠）293 名，还有笔匠 48 名，画匠 76 名，黑墨匠 77 名等。其分工精细，规模可观。经厂本的主要特征为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多用赵体，以白绵纸印制，开本舒展大方，多包背装，首册或钤“广运之宝”朱印。

明代内府刻书多数是司礼监负责，明刘若愚《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明周弘祖《古今书刻》、明吕毖《明宫史·内板书数》对内府刻书都有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内府刻书部分状况：《易传》、《御制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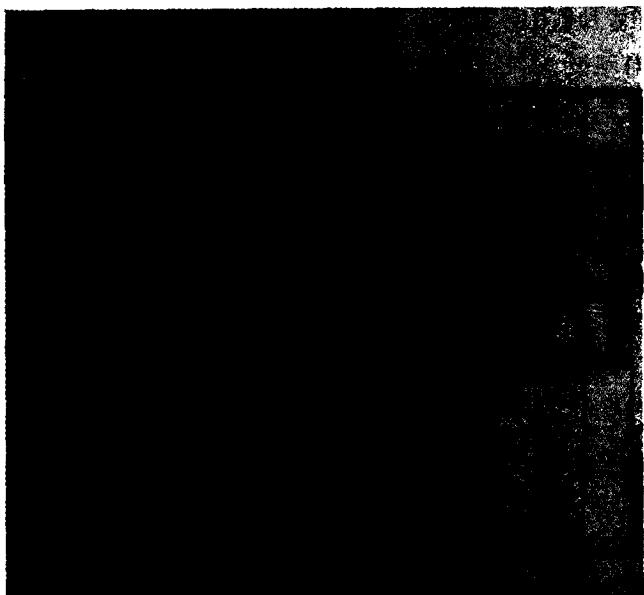


图二《古今列女传》永乐元年内府刻本



图一《历代臣鉴》宣德元年内府刻本

范篇序》、《周易大全》、《书传》、《书传直解》、《书传大全》、《诗传》、《诗传大全》、《春秋传》、《礼记》、《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孝经》、《达达字孝经》、《孝经直解》、《孝经大义》、《大学》、《中庸》、《四书集注》、《尚书孝经大学中庸》、《玉篇》、《广韵》、《历代纪年》、《资治通鉴纲目》、《洪武礼制》、《通鉴直解》、《贞观政要》、《大明官制》、《诸司职掌》、《文献通考》、《明伦大典》、《大明集礼》、《皇明典礼》、《勤政要典》、《御制大诰》、《大明律》、《宪纲》、《皇明祖训》、《祖训条章》、《稽古定制》、《历代臣鉴》（图一）、《外戚事鉴》、《昭鉴录》、《省躬录》、《古今列女传》（图二）、《高皇后传》、《通鉴博论》、《少微通鉴节要》、《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历代



图三《女训》 嘉靖九年内府刻本

通鉴纂要》、《大明一统志》、《孔子家语》、《刘向新序》、《刘向说苑》、《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女训》(图三)、《内训》、《内令》、《内则诗》、《女诫直解》、《曹大家女训》、《郑氏女孝经》、《千家姓》、《小学书解》、《百家姓》、《三字经》、《医按书》、《重刻证类本草》、《医要辑览》、《饮膳正要》、《周易占法》、《太上感应篇》、《小道经》、《启蒙书法》、《事文类聚》、《释文三注》、《释氏源流应化事迹》、《佛经一藏》、《番经一藏》、《道经一藏》、《千家诗》、《古文精粹》等近 200 种。

在明内府刻书中，以下几类书籍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法律书籍

为了巩固统治，朱元璋创立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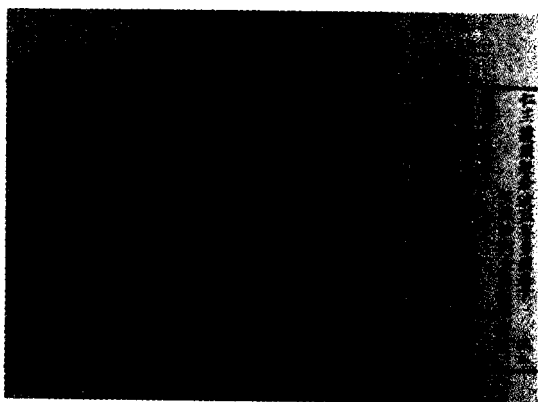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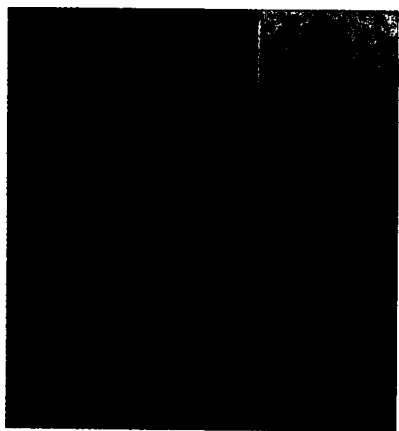
先后颁行各种法律制度，如《大明令》、《大明律》、《大明官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等，这些典章制度的创立，不但在洪武一朝起过很大作用，也多为后世诸帝所遵行。御制《大诰》，洪武十八年(1385)颁示天下，赐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生。十九年(1386)又有《大诰续编》、《三编》。“凡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其有《大诰》者，偶有所犯，减等治罪。”罪犯只要有《大诰》，就可以减轻罪名。

(二) 大藏经的刊刻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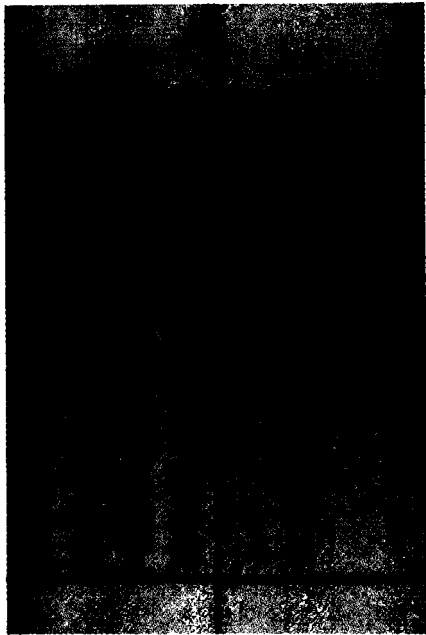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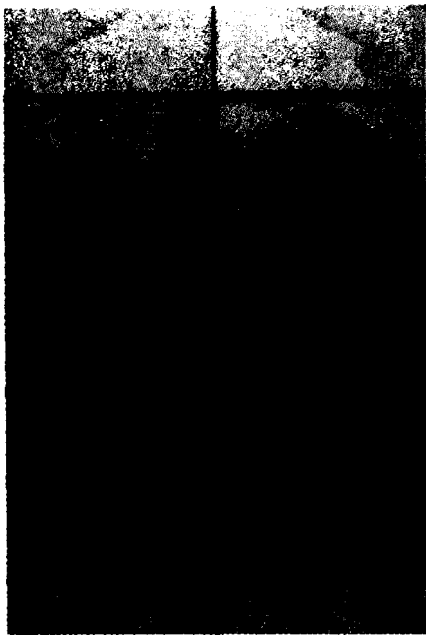
明代内府最大的刻书工程就是雕印佛教的大藏经。大藏经共雕印

过三部：《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洪武南藏》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登基不久，即于洪武五年（1372）敕令雕造大藏经，在江南等地广召名僧，整理校勘大藏经。并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的蒋山寺开雕。“洪武辛巳”年，全藏雕造完毕。“洪武辛巳”年，其实已经是明惠帝建文三年（1401）。该藏用千字文排序，从“天”字至“鱼”字，共 678 函 1 600 部 7 000 余卷。因在南京雕版完成，故称《洪武南藏》，又称《初刻南藏》。经板原藏金陵的天禧寺，可惜被永乐六年（1408）的一场大火焚毁。《永乐南藏》（图四 A、B）：“靖难之变”后，朱棣登基，世称明成祖。由于永乐六年（1408）的大火把《洪武南藏》的板片焚尽，无法刷印新的藏经，因此很多寺院无经可诵。再者，朱棣本人也是非常信仰佛教的。朱棣为燕王时，明太祖朱元璋请高

僧姚广孝辅政。正是这位高僧帮助朱棣赶走自己的侄子明惠帝朱允炆，坐上皇帝的宝座。由于上述原因，明成祖朱棣下诏重雕一部大藏经。大约在永乐七八年，于南京开雕，约于永乐十六年（1418）前后竣工。这部大藏经是以《洪武南藏》为底本重刊而成，但在编次及内容上有所改动。人们为了区别于《洪武南藏》，称这部大藏经为《永乐南藏》。全藏 636 函，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至“石”字，1 610 部，6 331 卷。共刻经版 57 160 块，藏于南京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批准，平均每年准许刷印二十部供各地寺院供养。据史料记载，该藏共分三等九级，《永乐南藏》中的精品，其正文用白绵纸印制，封皮用红、蓝、黄、绿四色綾子装裱，每函首册有释迦牟尼讲法的扉画，末册有韦陀护法像。华贵庄重，传世稀罕。而下等用纸很差，一般使用的是粗



图四 A、B （永乐南藏）永乐年间内府刻本



图五 A、B 《佛说阿弥陀经》

嘉靖四年内府刻本

糙的竹纸，封面使用的是染色蓝纸，可见差别之大。由于《永乐南藏》是以《洪武南藏》为底本翻雕的，因此部分老一辈版本学家只知《洪武南藏》，而不知《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同年，再次下诏雕印大藏经。这部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经，于明正统五年(1440)完成，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全藏 636 函，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至“石”字，1 621 部，6 361 卷。分赐各大寺院。明万历十二年(1584)又续刻 67 函，563 卷。内容包括各宗著作 36 种以及《永乐南藏》的 4 种经卷和目录。

内府除刊印上述三部大藏经外，还为帝后们的佛事刻印了一些单本经书。这些经书不仅开本较大，用料也非常讲究。例如：明天顺元年(1457)曾刻《妙法莲华经》；明嘉靖四年(1525)章圣皇太后刻《佛说阿弥陀经》(图五 A、B)；明万历十八年(1590)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刻有《佛说高王观世音经》等。

(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 和《赐号太和先生相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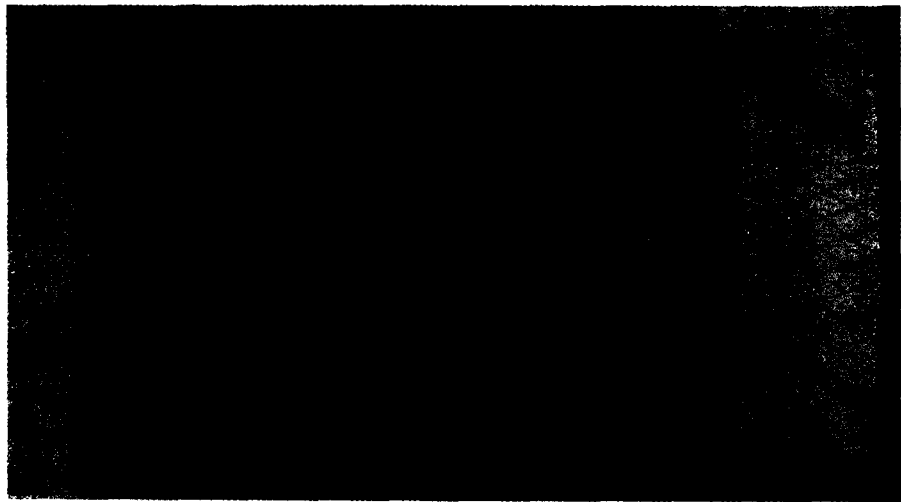
明成祖朱棣不仅刻印了两部佛教大藏经，而且还敕令编修道藏。永乐初年，明成祖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编修《道藏》。永乐

八年(1410)，张宇初去世，又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负责编修道藏事宜。正统九年(1444)雕版，明英宗朱祁镇诏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并增所未备。正统十年(1445)竣工。全藏480函，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至“英”字，共5305卷。这部大藏被命名为《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旨将一些缺漏的经籍校刊，共32函，也以千字文编号为序，始于“杜”字止于“纓”字，共180卷。名曰《万历续道藏》。嘉靖十八年(1539)，内府刻印了一部《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图六)。这是目前所知明代雕版印刷书籍中开本最大的一部。此书高76厘米，框高53厘米；书宽55.4厘米，半框宽45.8厘米。这位太和先生就是嘉靖年间著名的道士邵元节。此人

为何得到明世宗如此推崇？就是因为他多次为世宗占醮灵验。而这部《赐号太和先生相赞》，正是宣扬、赞美邵元节在宫中所取得的那些“业绩”。不难看出，当时的道教在皇帝的心中乃至全国所处的位置。

(四)《番藏》的刻印

西藏文大藏经在明代被称为《番藏》。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九年(1411)敕命刊刻于南京。明成祖朱棣在《藏经赞序》中称：“朕念皇考妣生育之恩，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纸印施，以资荐扬之典，下界一切之黎，均沾无涯之泽……赐寿梓于番经厂。”但是永乐年间仅完成了《番藏》的《甘珠尔》部分，一千多卷。而《番藏》的另一部分《丹珠尔》三千余



图六《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嘉靖十八年内府刻本

卷，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北京的番经厂完成的。关于《甘珠尔》的底本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张秀民先生认为，是采用了那塘古板《大藏经》为底本刊刻完成的；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永乐年间在南京刊刻完成的《甘珠尔》，是以藏经写本为底本刊刻完成的。

（五）《元史》与制书的编撰

明代内府还刻印过大量其他书籍。《元史》可以说是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由南京内府刻印的较早的一部史书。《元史》的编纂完成，不仅说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对总结历史的重视，同时也不难看出，由于当时元朝的残存势力还没有完全肃清，而《元史》的完成，正式向世人宣布了元朝的完结，一个新兴的大明王朝已经建立。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撰写了不少著作，其内容主要是教导子孙及大臣的。如《圣学心法》、《务本之训》、《为善阴鹭》、《孝顺事实》等。另外，明成祖朱棣还命大臣编辑或纂修了很多书籍，如《历代名臣奏议》，刊印后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洪武、永乐父子自撰及命儒臣纂修的书籍，当时通称为“制书”，约有一百余种。这些书籍是由皇宫内的一些机构负责刻印或司礼监所管辖的经厂雕印的。

二、中央政府刻书

（一）国子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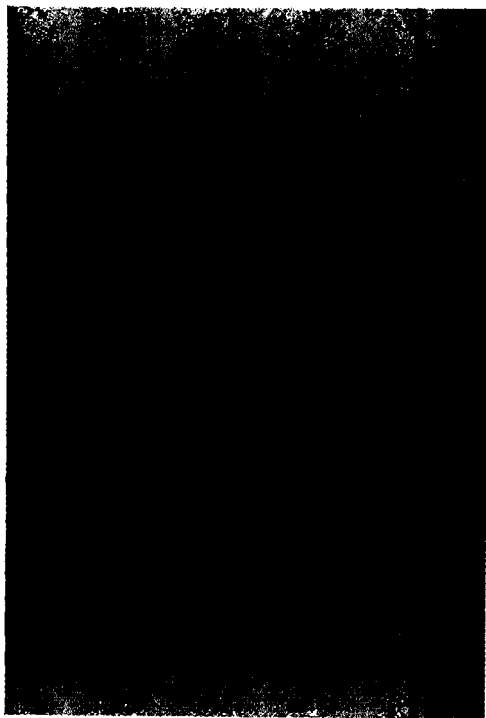
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都应天府（南京），称国子学为“大明国子学”。后因考虑到国学规模较小，仅似郡学一般，难以容纳全国生徒，于洪武十四年（1381），亲临鸡鸣山麓巡视后，朱元璋诏建国子学于此。第二年三月，国学建成，并改称“国子监”。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建北京，以北平府学为北京国子监，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南京成了陪都，规制照旧，其国子监则称“南京国子监”，北京的国子监成了大明国子监，后人分别称它们为南监、北监或南雍、北雍。南、北国子监都刻印了很多书籍。

1. 南京国子监

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南雍先后刻印图书270余种，有新编辑刻印的，也有利用前代版片修补重印的。南监自己刻书有二百余种，如：《二十一史》、《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通鉴》、《通鉴纲目》、《通志略》、《古史》、《南唐书》《文献通考》、杜氏《通典》等，为保存我国重要史籍作出了贡献。还出版过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书写的《百家姓》、《千字文》等多种法帖，供学习

者临摹之用。南监还刻印一些科技及农医方面的书籍如《天文志》、《营造法式》、《农桑撮要》、《农桑衣食》、《栽桑图》、《算法》、《河防通议》、《大观本草》、《脉诀刊误》、《寿亲养老新书》等。万历初，出版了《子汇》二十四种（图七）。南京国子监刻书最著名的是《二十一史》。嘉靖以前，南雍有宋版七史、元版十史及洪武时期的《元史》。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虽有修补，但未刊布全部史籍，嘉靖七年（1528），锦衣卫千户沈麟奏请命官校勘历代史书，刊布天下。于是皇帝命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两位博学者将史书逐一考对修补，



图七《子汇》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刻

以备传布。除所藏原版外，成化间，广东布政司原刻《宋史》也被送入监内一起校补。辽、金二史原无书版，从吴下购得二史善本翻刻，《二十一史》遂全。嘉靖七年（1528）至十年（1531），南雍重新刻印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辽史》、《金史》五史，其余十六史书版则略加修补重印。万历二年（1574）至二十四年（1596），南雍又一次大规模刊印史书，所刊者为《史记》、《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共十四史，其余七史则随时补刻。

2. 北京国子监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安定门内设立国子监，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又将北京国子监改为京师国子监。明成祖出于对南北方统治集团利益等多方面的考虑，完整地保留了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所有南京中央机构，形成了明史上“南监”“北监”并存的局面。北监刻书不如南监多，但据统计也有85种之多。目前所知，北监最早的刻本是成化四年（1468）刻印的《山海经传》。此外还有《务本直言》、《敕谕授职到任须知》、《本草方》、《幼小方》、《脚气方》、《楚辞》、《唐诗》、《临川集》、《淮海集》、《东莱集》、《青云赋》、《玉浮图》、《孟四元赋》、《珍珠囊》、《古史》、《千字文体》、《大学衍义》等。北监万